本版编辑：曹颖新
E-mail：m6@studytimes.cn
Tel：010—62806236

中华春秋

海昏侯刘贺的立与废

□ 张显传

经过五年发掘，南昌海昏侯墓发掘已基本完成，墓主的身份也已确认。现在，人们开始思考刘贺因何而立，又因何而迅速被废的问题，我们试从制度上探索其中的原因。

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，他始事改革政治，创设诸多制度，加强中央集权，尤其在礼制、立储和酎金制度上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巫蛊之祸

立储制度是古代社会的一个根本制度。汉代祖制实行嫡长制，长子能继承皇位，无长诸子可依次立为太子。

汉武帝有六个儿子，即卫皇后所生的戾太子刘据，赵婕妤所生的少子刘弗陵，王夫人所生的齐怀王刘闳，李姬所生的燕剌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，及李夫人所生的昌邑哀王刘髆。

按理，戾太子刘据既是嫡长子，又是太子，是皇位的当然继承人。元狩元年（公元前122年），他七岁时被立为皇太子。这时，汉武帝年富力强，正当时。武帝潜心培养刘据，让他学习《公羊》《谷梁》，提高他的文化修养，以便日后接班。元鼎四年（公元前113年）太子刘据接纳史节为内官，称良娣，史良娣为他生下一子即史皇孙刘询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不久，卫皇后、戾太子因与江充发生矛盾，引得很多麻烦，由此，太子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。这就是巫蛊之祸。

所谓巫蛊之祸，实与汉武帝追求迷信有关。由于他信神、求仙，导致方士、神巫聚集于京城，女巫往来于宫中，他们或左道惑众，教人超度；或挖地埋木，祭祀故人；或彼此妒忌，相互告讦，以至要诅咒皇帝。汉武帝听此消息甚怒，由此杀死后宫及大臣数百人。

征和二年（公元前91年）七月，汉武帝拜江充为特使，督察贵戚、近臣的行为。一次，江充在去甘泉宫路上，发现太子的车马行驶在御道上。这是违反规定的。太子派人请求江充宽容。结果，江充还是上告皇帝，以求得信任。之后，江充怕太子对他报复，便制造了巫蛊祸事。

他说汉武帝病在巫蛊，诬言宫中有蛊气。于是以专使身份，到太子宫中掘蛊，寻物，“专治巫蛊”。这时，汉武帝有病避暑甘泉宫，只有皇后与太子在京师。戾太子害怕，问计于少傅石庆子，决定抓捕江充等人。他们派使者去收捕江充，有人怀疑其中有诈，不肯受诏。有人逃归甘泉宫，说太子谋反。太子使舍人持节进未央宫，告令百官江充谋反，双方争夺激烈，长安一片混乱。汉武帝听后非常生气。丞相派兵要捕斩太子，太子发兵对抗，最后终因寡不敌众，激战五日，战败，出逃。

太子逃匿于湖县泉鸠里一带（今河南卢氏北），因主人家贫，难以供给太子生活，太子想另找友人帮忙。这时，汉武帝以前颁布的《沉命法》起了作用。法令规定：敢于藏匿义民者没其命，察捕不力者处死刑。本来，这一法令是对付人民起义的，现在则用于太子身上。是年八月，太子在转移过程中被人发觉、告发。他自度不得脱身，“即入室距户自经”。

与太子兵败自杀同时，他的三儿一女及卫皇后、史良娣等大批人员皆遇害。

昭帝即位

以后，人们已不再信巫蛊之事，都知太子被冤。征和三年（公元前90年）九月，田千秋上书皇帝，认为巫蛊之案验多不实，太子是被冤枉了。汉武帝拜他为大鸿胪，遂族灭江充一家，并为太子建造思子宫。

这一时期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非常突出：征和二年（公元前91年），丞相公孙贺父子因“骄奢不奉法”“诅咒武帝”等获罪，死于狱中，族诛全家。征和三年（公元前90年），丞相刘屈氂因谋立昌邑王刘髆而获罪。皇权、相权、皇室、宗室、官吏、外戚，地方、中央各种矛盾错综复杂，斗争必然引发人们的思索。

征和四年（公元前89年），汉武帝自叹过去为方士所欺，认为天下岂有仙人，尽妖妄耳。对于以往之事也追悔莫及，决定罢除方士求神之事。

戾太子死后，执政50年的汉武帝开始考虑如何立储、继承问题。六个儿子中，除戾太子刘据已亡，齐怀王刘闳早逝，广陵王刘胥骄嫚不能用，燕剌王刘旦以次第当立为太子，但汉武帝不喜欢他。昌邑王刘髆曾被人设计立储，也不可能再议。

这样，刘弗陵就成为唯一人选。

后元元年（公元前88年）正月，汉武帝想立少子刘弗陵为太子。但考虑少子年幼，母亲年少，恐怕会重演汉初吕后专权的故事，于是决定“去母立子”，即立太子的前提是赐其母钩弋夫人赵婕妤死。并请大将军霍光辅佐，以确保汉室承继制度的落实。

后元二年（公元前87年）二月，汉武帝病重，霍光问后事，武帝托孤受命，请他立少子为帝，并封霍光为大司马、大将军“行周公事”。同时还设车骑将军、左将军共领尚书事，作为辅政。

武帝死后，八岁太子继位，是为汉昭帝。

这时，霍光出于安抚的需要，褒赐燕剌王刘旦钱三千万、万三千户。可是，刘旦却不领情，怒目对曰：“我当为帝，何赐也！”

昭帝元凤元年（公元前80年）刘旦果然勾结宗室、官吏谋反，最后，刘旦与鄂邑长公主等失败、自尽。汉昭帝的政权才得以巩固。

历史上存在必然性与偶然性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汉昭帝在位仅13年。元平元年（公元前74年）四月，汉昭帝离世，年仅21岁，无子，帝位再次出现空缺。

于是，人们再次开始物色皇位继承人。此时，汉武帝的六个儿子中只有广陵王刘胥尚健在，有人主张立他为帝。但有人认为广陵王曾“以行失道，先帝所不用”，因此不可承宗庙。此时，具体主持朝政的是霍光，情急之下，霍光与丞相、太后紧急商议，决定迎武帝孙刘贺即位。

废帝刘贺

同年六月，刘贺被扶上帝位。刘贺的世系是清楚的，他的祖母是汉武帝的妃子李夫人。父亲是昌邑王刘髆，他死后由刘贺承袭王位，时年五岁。十九岁登上高位的刘贺，不懂得朝廷的政治规矩，以至上台前后做出很多荒唐事。如《汉书·霍光传》中汇总和罗列的：他在服丧期间，亡悲哀之心；废礼谊，居道上不素食；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，内所居传舍；始至谒见，立为皇太子，常私买鸡豚以食；“发玺不封”；“常与居禁阁内敖戏”；在前殿“引昌邑乐人击鼓、击钟磬”，鼓吹歌舞；“召皇太后御小马车，使官奴骑乘、游戏”；与昭帝宫人“淫乱”，等等。这些违反“祖制”常规的贪色、贪婪行为实在太荒唐，淫乱之事也太离谱。从出土的文物中所见大量的编钟、编磬、琴瑟、排箫等乐器，各种宝石、玛瑙，漆器看，说明他在生前也很“浪漫”。这使霍光非常郁闷。

有人以“审此人不可”，建议可按古之实例承告太后“更选贤而立之”。

为此，霍光按照朝廷的议事制度，在未央宫召集群臣会议，提出“昌邑王行昏乱，恐危社稷”，如何处置？议者一致同意唯大将军之命是从。

于是，霍光便率众大臣联名向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承宗庙状的意见。最后以刘贺“荒淫迷惑，失帝王礼谊，乱汉制度”，虽“数进谏，不变更，日以益甚，恐危社稷，天下不安”等一千一百二十七条过失，建议“当废”。得到皇太后诏“可”。

之后，霍光驱除刘贺的众臣，只召刘贺一人入内，闭门，由宦者守卫，向他宣布太后废帝诏书，刘贺于此结束27天的皇帝生涯。

为了安抚刘贺，霍光亲自将他送往官邸。刘贺说：“愚戇不任汉事。”霍光说：“王行自绝于天，臣宁负于王，不敢负社稷，愿王自爱。”若按原来“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”的规定，他应该发配远处。但这次情况特殊，对他格外开恩。太后下诏让他回到昌邑，并赐二千户。元康三年（公元前63年）汉宣帝又封他为海昏侯，但不能参与奉行天子之礼。

从立与废的全过程，刘贺因不守制度与规矩受到了废黜，处罚促使他认识遵守朝廷规矩的重要性，这从出土文物中可得到证明。墓内最引人注目的是378件金器：金块、金饼，马蹄金、麟趾金。这些金器既可作为墓主人身份的象征，也是政治制



度的明证。西汉酎金制度规定，侯、王要在每年八月祭祖时把酎金送到朝廷，朝廷会根据所献酎金做出评定。元鼎五年（公元前112年），汉武帝因列侯所献酎金的分量和成色不足，就夺了106人的爵位。那时刘贺虽未出生，但是，他懂得这一历史教训。这次出土金块中有“南海海昏侯臣贺，元康三年，酎金一斤”字样。元康三年正是汉宣帝封他为海昏侯的时间，小心制作成色很高的酎金，说明他遵守酎金制度，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爵位被夺。神爵三年（公元前59年），刘贺病逝于昌邑。年仅33岁。

宣帝中兴

就在人们开始物色、确立皇位继承人期间，有人向霍光报告，在民间发现了史皇孙，即武帝的曾孙刘询。

当戾太子全家遭遇巫蛊之毒时，皇曾孙刘询尚在襁褓中，小名叫病已。为安全起见，人们把他送到祖母史良娣家。史家让他学会躬行节俭，慈仁爱人，接受诗书礼仪教育，已将史皇曾孙抚养成人。

霍光等人开始“议定所立”，认为：依据太宗无嗣，可择旁支子孙贤者为嗣的原则，在其他王子、王孙中寻找继位者已无可能的情况下，选择刘贺为帝，是无可奈何之举，也是失败之举。现在，既然刘询已在民间找到，他既是武帝曾孙，属于长子长孙。而且，武帝时就有“掖庭养视”之遗诏，至今年十八，有修养，近亲中唯有戾太子之孙皇曾孙刘询可以继位，奉承祖先宗庙，维护长子继承制。遂后报告皇太后认可。

当年七月，刘询即皇帝位，是为汉宣帝。

历史证明，废刘贺、立刘询的做法，不仅维护了制度的一贯性，更重要的是给西汉社会带来稳定与繁荣。汉宣帝励精图治，信赏必罚，知道民间疾苦，尤得安民之要，文治武功，皆有佳绩，安定宗庙，业垂后嗣，人称中兴。

从三个数字看国情

□ 贾虹生

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，就要一切都从国情出发。现在不少人看问题、提诉求，甚至很激烈，很多都是脱离具体国情而主观产生的。究竟什么是国情？可以有各种各样、许许多多的表述。笔者认为：中国有承载着5000多年文化的13亿多人，生活在欧亚大陆东南一隅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，这就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。这可不是简单的三个数字，把它再细化和排列组合，就能生发出一系列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。

比如，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，不可谓不大。但在它上面生活着13亿多人，其生存空间又不能算大。特别是这么大的国土面积，有四分之三是高原、山地、丘陵和沙漠，可耕地面积不足20亿亩，要养活好如此庞大的人口的确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，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，都身处在这种极不容易的事情之中，都无可避免地受它制约。这种自然条件要求我们有很高的农牧业产出，才能解决粮食安全和民族生存问题，所谓“民以食为天”，手中有粮才能心里不慌。这个最大的民生问题解决得怎么样？可能很多国人并未注意到这个问题。我国粮食单产水平是世界粮食单产平均水平的一倍，而我国农业平均用水量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。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粮食生产水平已经相当高了，基本达到了粮食自给程度，这已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了。另一方面，也说明我们的农业生产处在脆弱的状态，一旦遇到大灾，特别是大旱绝收，则会出现粮食紧缺，民生遇险的情况。难怪我们党和政府每年都要发出“一号文件”，指导农业、农村、农民问题，从不敢掉以轻心。难怪我国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，必须坚守18亿亩农业用地的红线。也正是党和政府精心竭力地耕耘农业，才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社会稳定。对此，我们不应该熟视无睹，而应有起码的认可和自豪——中国和中国人的自豪。同时也应保持起码的忧患意识，关注“三农”，正确面对这一最大的民生。

再比如，我国处于欧亚大陆东南一隅，北部是荒漠，西部有世界屋脊的高原，东部、南部有大海。历史的原因，造成我国与其他强国较远，使它能够形成自己特有的农耕文化。而且这一文化从未间断地连续传承了5000多年，成为世界上唯一保留至今的文明古国。从古老农耕文化中衍生培育出儒、释、道并存的中华文化思想体系，已经深深融化在民族的血脉里。这一现象既值得我们有民族的骄傲自豪，也可能成为我们向新历史迈进的巨大包袱。外部世界没有人能彻底改变这个状况的，这也就是我国不可能全盘西化的社会文化原因。我们只能与时俱进地向外部学习，在自己既有的思想文化体系基础上完善自我。事实上，自晚清开始的西学东渐以来，“五四”运动自下而上地要打倒“孔家店”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又自上而下地全面“扫四旧”，其结果都没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，只是像被冲击的黄土高原一样，有了许多沟沟壑壑，但雄浑的高原依然沧桑挺立。这就是中国的历史，也是中国的现实。是所有中国人不能不面对的问题，也是研究中国的外国人不能忽略的内容，否则，会像盲人摸象一样不得其要领。

千万不要小看文化的影响力。当今世界上存在许多文化，西方国家的文化被称为主流文化，它的确对世界的格局产生巨大影响。但它又未能统治全球，也未见能解决全世界的根本问题。说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”，就文化而言，恐怕是谁都不可能彻底压倒对方。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时，采取完全对抗的心理和策略，一定不会最终获得成功。因为人是高级生物，他不仅有生物属性，也有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。人类在为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中，不断适应自然环境，部分地改造环境，既创造出自身想要的环境，也同时创造出自己的文化。而不同民族创造出的不同文化，又与它的生存条件密切相关联，怎么可能让水边的民族和山地的民族采用同一生存模式、同一思想文化呢？

《文明的冲突》预言了西方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冲突。后来发生了“9·11”恐怖袭击事件，而后紧接着是阿富汗战争、伊拉克战争、与伊朗的对立，再后来就是北非、阿拉伯世界的“茉莉花革命”。那么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，谁能最终压倒谁呢？是不是一定由“西风”，特别是盎格鲁—撒克逊体系，最终压倒“东风”，世界才能平静？按我们中华文明看，会觉得“冤冤相报何时了”啊。看起来解决人类之间这种冲突问题，还得从我们中华老祖宗的教导中寻找办法。假如亨廷顿教授写一本《文明的融合》，是不是会对这个世界更好呢？马克思提出“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，才能最终解放自己”。运用这一理念，我们可不可以提问：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既然不能解决全人类的问题，那么它也一定会被别的东西所取代？这是不是全人类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？

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人口众多的国情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，美国人曾经预言，中国政府离开了西方的援助，根本养活不了自己的4亿人。实际情况是，我们不仅基本依靠自力更生，养活了自己的国民，而且通过改革开放，又使7亿人脱贫，全民开始了小康的生活。

人口众多，对于国家治理而言，究竟是一个量的问题，还是一个质的问题？治理一个几百万人的国家，与治理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，会有什么不同呢？如果考虑到自然禀赋、资源环境这些无法回避的客观因素，小国和大国生存和发展的边界条件，就是根本不同的，它们所采取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也就必然会有本质的不同。所以，当我们放开眼界学习借鉴世界先进可行的做法时，绝对不可以无视我们自身的环境条件。

文化视野

『良史』与『秽史』对中国的影响

□ 王丹誉

贞观十六年（642年），唐太宗想看看记录自己言行的《起居注》，却遭到掌管者褚遂良严词拒绝。太宗连忙问：我有过失也记吗？褚遂良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臣职当载笔，不敢不记！”另一个史官刘洎接着说，假如褚遂良不记录，“天下亦皆记之”。贞观十七年（643年），唐太宗看到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录“语多微文”，就对宰相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：我当年发动玄武门事变是为了安社稷，利百姓。史官干嘛要隐讳呢！立即命令，“削去浮词，直书其事”。也正是因为唐太宗这种尊重历史的精神，在他的时代不仅完成了中国二十四史中的“八史”，而且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光辉灿烂的“贞观之治”的盛世局面。

公元前607年，晋灵公昏庸无道，正卿赵盾经常劝谏，他不但没有改正，还要杀赵盾。赵盾只得逃到外地。当他逃出国都，听说族弟赵穿在桃园宴会上杀死灵公，于是返都，另立晋成公。赵盾继续做正卿，主持国政。晋国史官董狐在史册上赫然记下：“赵盾弑其君。”并高悬于朝堂之上，赵盾连忙解释，自己与弑君事件无关。董狐严厉批驳：“你官居正卿，出逃没有离开国境，还都更没有查办凶手，所以要承担弑君的罪名。”赵盾虽仰天长叹自己被冤枉，但对董狐没有丝毫加害。孔子称赞道：“董狐，古之良史也，书法不隐。”史称“董狐直笔”，同时称赞赵盾是“良大夫”。

史官前仆后继，以生命来捍卫历史的尊严。公元前548年，齐国的权臣崔杼杀了齐庄公，立齐景公，自己做了国相。齐太史在史册上记载：“崔杼弑其君。”崔杼杀了这位太史。因为太史之职是家传世袭，被杀的太史的两个弟弟先后继任太史还是这样写，都被杀了。太史的第四任太史仍然这样写，崔杼终于折服，而没有再杀他。有个名叫南史的史官听说太史兄弟相继因直书被崔抒全部杀害，自己就决心用生命捍卫史册的真实。他紧握着写着“崔杼弑其君”的木简前往朝堂，途中得知第四任太史的真实记录已经得到朝廷公认，才中途返回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记载了齐史官“身膏斧钺”的事迹，南史和太史们的不畏强暴，秉笔直书的壮举，被誉为后世史官的典范。

久负盛名的《三国志》，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并称为“前四史”，共同开创中国正史的先河，成为后世史册的典范。作者陈寿“善叙事，有良史之才”，备受后世青睐。然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陈寿以立传为由向当事人子弟索贿的史实也被载入史册，他的良史之材和笔下史册也因之有了瑕疵。《晋书·陈寿传》记载：丁仪、丁廙兄弟两个是魏朝鼎鼎大名的人物，陈寿在作《三国志》时曾对其子弟说：“可觅千斛米见与，当为尊公作佳传。”人家没有给他送米，陈寿也因此没有给丁仪、丁廙二人立传，给原本可以更加完美的千秋史册留下缺憾。后世还评说陈寿，在著史之中公报私仇。陈寿父亲当年给马谡作参军，马谡为诸葛亮所诛，陈寿父亲“亦坐被髡”，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早年曾小看过陈寿。因此，陈寿在著史中对诸葛氏父子评价：“谓亮将略非长，无应敌之才；言瞻惟工书，名过其实。议者以此少之。”史家认为也是有失公允。

北齐天保五年（公元554年），“二十四史”中最烂的一部——《魏书》完稿。书稿一经问世，朝野哗然，都骂是部“秽史”。三年前，身居中书令兼著作郎的魏收正式受命撰《魏史》。此时，他就骂街：什么东西敢和我过不去，我“举之则使上天，按之则使入地”。可见狂妄至极。完稿后，众口喧嚷，指为“秽史”，尽管他动用了自己手中中书令的权力，还借用了皇帝极权，以“谤史”罪对批评“秽史”的人横加暴行，“然时人终不服”。至于这部“秽史”几经修改才发行于世，据传作者魏收甚至在死后被掘墓抛尸。这都是后话。魏收机警能文，号称“北地三才子”之一，但生性轻浮，人称“惊蛱蝶”。他是个轻浮的“才子”，所处的是荒唐的时代，才抛出这部臭名昭著的“秽史”。

唐太宗大度开明尊重历史，赵盾为法受恶以成良史，董狐不曲私阿世秉笔直书，历代明君、贤相、良史们共同造就的直笔信史光照千秋。同样，崔杼、魏收之流，暴君、奸相和“才子”们共同炮制出的曲笔“秽史”，也遗臭万年。千秋史册，千秋功罪。南史冒死继书身膏斧钺，陈寿念一时之贪成千古之恨，魏收乘一己之快留千古骂名。修史、为官、做人，都可以从中有所感悟。

有所思